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主要的读物是加大字体印刷的历史、文学类古籍资料，工作人员把它们统称为“大字本”。1972年10月，毛泽东指示，找一些专家注释一些古籍，印成大字本给他和中央一些领导人阅读。此事立即得到落实。大字本被制作成一种长30厘米宽20厘米的线装书，部分文字用繁体，字号用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全部用60克米色道林纸印刷。毛泽东的晚年阅读了大量的大字本古籍资料，在其中作出批示，并多次推荐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阅读。

抒情与喻政的灵感源泉

在有很多现代书籍可读的情况下，毛泽东特意印出大字本有许多内在的原因。

首先，这与他当时眼睛不好有关。在中央苏区和陕北期间，毛泽东经常在窑洞昏暗的油灯下通宵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用于读书和阅读文件的时间也相当长。长期大量的读书损伤了他的视力，到了晚年则日趋严重。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上了白内障，视力更是每况愈下，发展到后期，戴老花镜也不解决问题了，还要加上放大镜才能勉强阅读。

毛泽东要求搞大字本，还与他晚年情怀有关。进入1970年代，毛泽东晚年虽仍外出视察，还坚持游泳，但许多病况已经出现，加之因视力不济，读书愈加吃力。即便如此，毛泽东仍需要下功夫阅读或重读一些古籍，读书是他自幼少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无法舍弃。毛泽东自知时间已经不多了。一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毛泽东，壮怀激烈。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感、一个人民领袖的爱国主

义情怀尤为强烈。以毛泽东的特点，他特别需要借助于古典诗词抒发他的晚年情怀，抒发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也抒发他对生死问题的感慨。这一时期，在为毛泽东制作的大字本中，收录了许多豪放、慷慨、雄厚的宋词，比如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毛泽东不仅通过大字本反复读宋词，还在大字本上及其他材料上的批示中提到一百多首宋词，而这些仅仅是他晚年涉猎宋词的一部分。

同时，毛泽东还让党内高级干部从阅读古籍入手，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并通过古文的原意、隐喻，以及他在大字本上的批示，让党内高层更充分地了解他如何思考国际国内大局及相关对策。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毛泽东不仅把大字本当作阅读工具，也注重研究、考证与修订，阅读十分认真。有一次，毛泽东在阅读《晋书》中的《刘牢之传》时，发现了一个错字——“滌溪”的“溪”错印成了“漢”。毛泽东随手标了出来。两字形似，是印刷厂工作人员排错的，校对人员也没有发现，后来层层把关的人都没有看出来，却被毛泽东看了出来。

熟悉历史和古籍的毛泽东，还对注释大字本中的文章提出不少意见，指导注释大字本。历史学者负责注释的《枯树赋》印成大字本送毛泽东看后，他先后提出了七条意见。

毛泽东这样看重大字本，阅读又是如此仔细，使参与大字本注释工作的人也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工作。因

此，当年注释的大字本，考证之细、注释之精当，都是无可挑剔的，为我国古籍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历来十分重视，但当时中央有不少高级干部不认真学习，不爱学习，甚至根本不学习。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一次，他阅读大字本《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吕蒙在孙权激励下发奋学习的内容：“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毛泽东立即将这段文字批给中央政治局全体人员阅读，以此激励高级干部重视学习，认真学习。

“九字方针”的出处

毛泽东拿到新印制好的大字本，先自己看，然后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阅读。他期望通过大字本中的典故来喻政，让高级干部能够汲取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智慧，指导当时中国带有全局性的工作。

当年的国际形势是苏美争霸，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设想了中国当时应对国际局势应该采取的大政方针。他阅读大字本《明史·朱升传》后，特别注意到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在这九个字下重重地画上线。毛泽东受到这九个字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九字方针。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这一方针，使之在当时成为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几乎各行各业都围绕于此

调整了工作重点，从而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更为具体化。

《晋书》四传合订本的寓意

毛泽东阅读《晋书》大字本《谢玄传》《谢安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后提出，要把这四个大字本合订为一册。合订本送来后，毛泽东两次看过，并且亲笔在上面批了“政治局同志一阅”八个字。毛泽东所以这样做，与他当时对国内和国际大局问题的担心、考虑、设想有关。周边国际形势紧张，毛泽东担心一旦出现大的战事，军队中将没有杰出军事将领带兵打硬仗。

毛泽东通过阅读大字本《谢玄传》喻示全党，中国要有谢玄那样的将军，才能像淝水之战那样战胜入侵中国的强大敌人。正是按此思路，毛泽东不久就解放并且重用了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军队干部。在中央，毛泽东让李先念从党政工作领导岗位重返军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他还在党内强调：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毛泽东推荐中央政治局成员阅读《桓伊传》，表明这样的意思：在中国，有桓伊那样的人，才能维护内部的团结。毛泽东阅读大字本《谢安传》后，推荐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阅读，以此表明，中国大局的稳定，需要能够稳定大局的人才，党内要有东晋时谢安丞相一样的人才方能稳定大局。不久，毛泽东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并且安排在中央重要领导岗位上，这与他读《谢安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刘牢之传》中讲到刘牢之欲举兵反桓玄，他“集众大议，

得其所。”这一段论述非常伟大。因为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生命观与价值观的最终体现形式。在人的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一切关于幸福与否、成功与否的讨论抵达了终点。人的一生最终呈现为怎样的价值，其衡量的标准并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人民。这就为共产党人的价值规划定了最终的判断依据，也为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划定了最终的判断依据。这种震撼人心的超越意识，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人类命运的真切关注，更体现了一个具有担当意识的政党，在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给人民许下的伟大承诺。这样一种承诺所彰显的，正是共产党人舍生忘死的人民信念。在这里，个人的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在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共同目标中得到了最大的显现。

今天需要怎样的价值观

今天的我们并非身处枪林弹雨、民族危亡的时代，而是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之上。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罗马的讲话——“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给了我们一个真切的答案。这句话具有两重深刻的意义。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勇毅信念。古代圣贤常言“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习近平总书记借古人之境，谈的恰恰是我们当下的奋斗。因此，“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所应对的，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追求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另一重则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生命观密切相关。正像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所谈的无我，恰恰是將小我融于大我，融于人民的奉献与担当。只有当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命运，与最广大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之时，你才能看到自己的力量与真正的幸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相信可以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全中国13亿多人民勠力同心来承担起这副重担，把国家建设好。我有这份自信，中国人民有这份自信。”



实际行动启示党内高级干部。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上写下批示，对邓小平的历史和能力给予肯定，为他的复出奠定了基础。

批给周恩来的大字本

有个别大字本，毛泽东曾经专门批给某一个人阅读，这一般是有针对性的。中央筹备党的十大期间，毛泽东对组成党的十大的班子有考虑，他正式决定起用邓小平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为此，毛泽东也是先用大字本喻政。他指示，要搞《史记·汲郑列传》的注释，印成大字本。这篇传印成大字本后，毛泽东批给周恩来看。

《史记·汲郑列传》中讲了这样的典故：汲黯为官，善于抓大事，对于具体的事则主要交给下属去办。而郑当时为官好举贤，他举贤唯恐缓慢。而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这篇传中讲了这样的事：汲、郑二人有权有势时，到他们门上经常拜访者很多。当他们失势时，门可罗雀。毛泽东借此提醒，不要忘记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和“靠边站”的人。

周恩来读后，再结合毛泽东给邓小平来信的批示，立即领悟了毛泽东的用意。周恩来立即按毛泽东的意图，用各种方式把一大批在“文革”中或被打倒、或被隔离审查、或被“靠边站”的省部级以上干部保护起来，又解放和使用了一批老干部。邓小平不久即复出。

1975年夏初，毛泽东身体已很衰弱，他提出注释晁错的《论贵粟疏》、宋词《江梅引》，以及《晋书》中的《苏峻传》《孙恩传》。但上述典籍付印后，毛泽东的精力却不济了。大字本的历史至此结束。

大字本提炼了一批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典籍，并经毛泽东之手起到了重要的以书喻政作用，从而影响了中国在历史关键时期的历史走向，使中国更顺利地迈向巨变和腾飞的时代，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生动再现 新中国成立时的磅礴图景

——《领袖与开国大典》一书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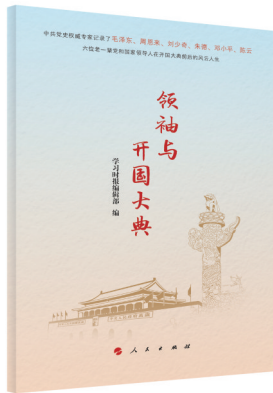
□ 吴 青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前的开国大典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新生，成为难忘的历史瞬间，永远镌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上。在开国大典前后，作为推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实现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开国元勋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新政权的巩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由学习时报编辑，反映开国元勋为共和国事业和人民幸福砥砺奋斗的《领袖与开国大典》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本书是《初心与使命》的姐妹篇，收录了《学习时报》2019年2月4日至15日公开发表的6篇系列文章：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前后、周恩来在开国大典前后、刘少奇在开国大典前后、陈云在开国大典前后、6篇文章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开国大典前后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夙夜在公、呕心沥血的光辉事迹。文章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的中共党史权威专家。他们长期从事革命领袖思想生平研究工作，在文中精选史料，用有限的文字，生动详实地串联起领袖笃信信仰、投身革命的关键人生节点和重要历史环节，彰显了革命前辈至大至公的革命情怀。

这些文章重在展现开国领



袖们描绘新中国建设蓝图的雄才大略和伟大品格，生动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磅礴图景。系列文章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被中央媒体网站和门户网站转发，并均被推送至人民网首页，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系列文章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指导我们实践的规律性认识，让读者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强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最好节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本书适合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参考辅导读物；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信念抱负具有积极的意义。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重读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 林雅华

青春的生命无疑是热烈的，人生一切未确定，同时也就拥有无限的可能。因此，青年时代的追求奠定了一个人的价值观。那么，对于青年人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

马克思笔下的价值观

马克思在1835年的一篇文章《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谈到：“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可能由我们长期从事，但始终不会使我们的热情冷却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会将怨天尤人。”

确实如此，在读书受教育，而后走向社会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被钱理群先生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人？因为他们在读书求学就业的道路上，貌似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通晓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其内在根底并没有超越个人得失的一点点精神空间的存在。正是因为如此，“成功”与否所引发的内心焦躁、情绪动荡主宰了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使得他们在外表的精致背后，始终处于焦灼与痛苦的深渊，不可自拔。而这样的“成功”获取的越多，其内心的困顿与不安就越是与日俱增，甚至把自己压垮，陷入虚无的现代性荒原。

正像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提到的，“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想要超越个人成败得失所带来的飘忽不定、心慌意乱，唯有真正放下这障目的一叶，看到个人背后的无数人，看到个人背后作为“类”存在的人类总体，我们才不会在可怜的、自私的、有限的乐趣中，拼命争夺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才不会随随便便地在命运的击打中颓然败下阵来。内心的安宁或者自内而外的幸福感、成功感的获得，并非摒弃一切外在诱惑的自我修行，而是将自己投身到更加伟大的事业中，无私和忘我地奉献。孟子有云，君子善养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不是在静坐悟道中养成，而是养成于天地苍生与奔走颠沛之间。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文章的最后这样谈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人类的理想追求中最神圣、最崇高的东西，就这样在最朴素、最简单的话语中流淌而出。衡量价值与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物质条件的满足，也不在于任何个人的“丰功伟绩”，而在于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终身。马克思在他的青春时代，就已立志将个体的生命完全投入到无限的人类事业当中了。他所思虑的宏大的问题与建构的伟大理论体系将光芒永驻。

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信仰是一种与人的生命状态紧密结合的内在追求。在无知无明的状态下，信仰的坚定性无法得以显现，唯有在艰难困苦、穷乏困顿之中，信仰才可能真正显示出其分量。因为信仰本身，不是为了满足即时的目的而存在，而是为了满足长久、具有根本性的人生追求及生命意义而存在的。因此，诞生于民族危亡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其思想与行动，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性，也为当下的我们指明了，何为真正的扎根于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观，何为真正的来自于人民、奉献于人民的价值观。

1937年，毛泽东提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这不仅是一种思想建党的要求，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最基本的价值选择和伦理选择。在这里，个人的利益要服从于革命的利益，也就是服从于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个人的价值是在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得以凸显的。在1939年的《纪念白求恩》和1944年的《为人民服务》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更加具体地阐释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和生命观。在《纪念白求恩》中，他谈到，“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在这里，共产主义精神不仅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更被界定为一种毫不利己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对于人的价值的深刻探讨，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流逝，磨损其光芒，反而在和平时代的今天，更加凸显其深邃内涵——人生的价值与幸福感的获得，并不依赖于外在条件、个人地位、物质基础，而是更为深刻地与人的精神追求紧密相关。这种精神一定是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普遍地人与人的精神追求紧密相关。这种精神一定是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普遍的人民情怀。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对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进行了最为彻底的阐发。他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